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照片进入历史

畅销书是怎样炼成的

从工人运动视角观察中国社会

独立小书店的死与生

波士顿情书之九

——今夜有雨一起裸奔

群山之上，大地深处

——盖瑞·施耐德访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言一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燕舞(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7、8月 第6卷第6期

总第57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从大暑到立秋，再到如今的处暑，节气的更迭永远赶不上生活中事件的汹涌，尤其对于那些把微博当作窗口的人而言。不妨自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带来最大冲击的事件是什么？我自己在瞬间的茫然相信也足以折射大多数的人的困境：限于生理构造，许多事件只能作为短期记忆而被遗忘。他人的遗忘不应成为踏上道德高地的垫脚石，倒是遗忘背后的某种迟钝或许值得分析。

以北京7.21暴雨为例，从大多数事后集中于城市基建的声讨中，激烈的情绪背后依旧是对“城市”之认识的苍白；依然少有人去反思去细探在过去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的城市究竟在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成长”，并且最终长成了什么？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曾经和即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我深信：不仅仅是政府官员，还包括生活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把“城市”当作了某种理所当然的不变的客体，一如他们对于日常建筑空间的漠视。要走出这样的近视或是漠视，除了阅读书籍之外，恐怕更需要学着在缓慢与反复中阅读自己，他人，街区和城市。

若以期数为准，本期指向的是《独立阅读》的5周年。纵然现世不安，我们却各有理由期待下一个

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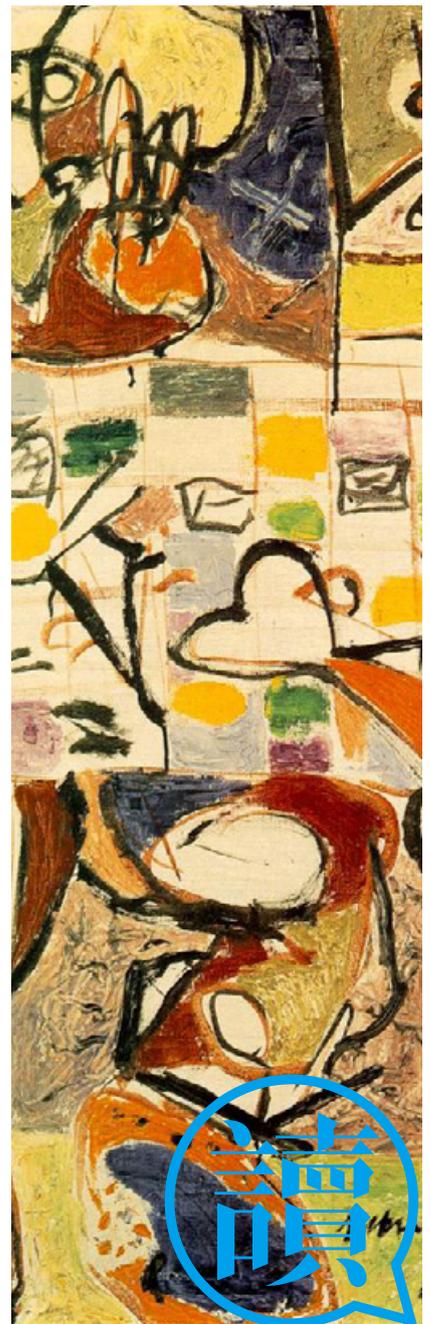
读者来函：

其中说到基本粒子可以继续切分这个话题。其实现在的主流观点，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有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随着基本粒子的分割，内部的力会变化，越来越大，趋向无限。还有一种认为，强行分割其内部受力会导致塌陷而出现黑洞，这样它就成为了不属于这个宇宙内的物质了。

——拇姬

轮编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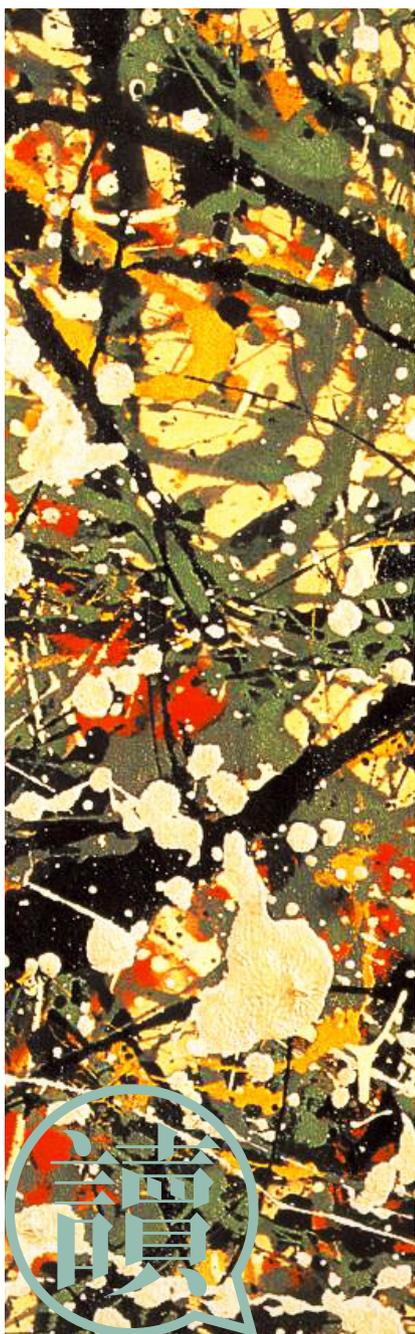
上期编者按主要是在打比方。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物理上的物质是不可无限切分的，但从数学的角度却是可以这样思考的，这是极限思维。因为编者按篇幅有限，所以没有罗列这些知识。谢谢补充！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Key 1946
Jackson Pollock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5-020

影像

• 汪伟
照片进入历史

050-063

书评

• 刘柠
畅销书是怎样炼成的

• 凌越
从工人运动视角观察中国社会

050-063

随笔

• 严飞
独立小书店的死与生

• 罗四鸽
波士顿情书之九
——今夜有雨一起裸奔

050-063

访谈

• 荣荣
群山之上，大地深处
——盖瑞·施耐德

064-075

上期更正：

第8页左侧第一段“相同性质的著述，孔飞力还有一本《》” 此处脱漏的书名应为《晚清帝国的叛逆者及其对手，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作者栏漏掉了《香港——五十年不变与十五年之变》的作者米格，现居香港。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造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之墓想必会是读书人顺路凭吊的地方。墓园不大，且为西式风格，清净朴素，蒋中正为胡适题的“智德兼隆”隐隐透露出墓地主人的昔日声誉。在墓旁的草坪上，不经意看到两块低伏的浅浅墓碑，一块是胡适二子祖望之碑，另一块则是祖望为其弟胡思杜所立。当年天地玄黄，政权易帜，思杜留在大陆，却因政治情势反戈其父，最终则在反右运动中不堪凌辱而自杀，时隔多年，祖望为其立一石碑，或许是想为其受苦的胞弟招魂吧。

从胡适墓地旁的小径入，不久即可见一中式坟冢，此处安息的并非旁人，乃是当年研究甲骨文的“甲骨四堂”之一的“彦堂”——董作宾先生。甲骨之学，自然非笔者所能道说一二，不过那一代研究甲骨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可以折射出20世纪这个大时代的某些面向。在“甲骨四堂”中，郭沫若与王国维的命运为人所熟知，“雪堂”罗振玉作为满清遗老，早逝于旅顺，不必赘述，董作宾先生则是“甲骨四堂”中唯一一位将此绝学引入台湾的学术拓荒者。山间清秀幽静，其塚掩映于烈日绿荫之间，也难免透出一丝难言的寂寞。

傍晚入台大旁赫赫有名的“唐山书店”，一眼就瞄到何伟的《**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卢秋莹 译，八旗文化，



图为董作宾先生之像

2011年12月),他写的《寻路中国》与《江城》已在大陆掀起了“阅读中国”的风潮,不过这本《甲骨文》却因种种原因无缘大陆读者。在这本以“甲骨文”为题的书中,陈梦家的身影若隐若现。关于陈梦家,熟悉新月派士人的或许还会对他早年诗歌存有片段的印象,“我从侧面窥探,她在庄严下冷淡的,沉默著一抹笑角的希微。”

这种对“神秘性”的兴趣或许早已预示了陈梦家未来的甲骨文研究之路,不过在何伟笔下,陈梦家显然不仅仅是一位甲骨文研究专家,而更像是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隐秘的钥匙。陈梦家死于自缢,在十天前,他还曾尝试过服用安眠药。以这样反复决绝的行动去结束生命,自然因为是他对时代荒谬与屈辱的不堪忍受。为了理解陈梦家的死,何伟找到昔日批判过陈梦家,如今已位高权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当年后者以弱冠之龄攻击学界前辈“自命甚高”、“竭力鼓吹自己”。关于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李学勤充满了悔意,他如此回答,“文革发生的时候,如果人们批判你,你开始觉的自己真的有错。我那时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说的。每个人都是那样,那是社会心理学的一种。那么多敌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敌人。”

“似乎所有人都是敌人”,或许的确代表那个时代普遍的人心状态,否则胡思杜也就不会批判其父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然后在被打成“汉奸”、“走

狗”后毅然弃世。我们常说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怀疑与猜忌,或许,这一切都可以从当年的“视人如敌”找到一脉相承的线索。

一旦看到人心的幽暗深邃,势必就不会将20世纪的种种劫难简单地视为制度间的彼消我长,而会注意到人类精神在历史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被异化。这不仅仅是政治的危机,也是人心的危机。

因此,极权主义的首要任务,除开政治上的控制,人心的操弄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如此,在极权主义的体系中,“宣传”也就成为重要的动员与控制手段。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中显然注意到极权主义的



“宗教面向”，或者说极权主义在“人心”的操弄方面，具有沃格林所称的“准宗教”特色。因为它基本上都会声称一种绝对性的真理和完美的政治乌托邦，从而进而推导出“元首永远正确”、“党总是正确的”等等结论。如果“宣传”只面对成人世界，那么大抵还不会让政治的狂热与迷失传宗接代，但在极权主义体系下，“宣传”是从摇篮到坟墓，从城市到乡村。例如在纳粹德国的学校中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诗歌，“十指交叉你的双手，鞠躬低下你的头，默念五分钟希特勒，是你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 还满足我们每一需要。”而在东德时期，“希特勒”

则被巧妙地置换为“斯大林”。

这样的宣传当然具有极大的魔力，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很难避免失败的命运。彼特沃克精确地洞察到，一个国家无法强迫人们接受长期充满激情的信仰，当政治的控制们与宣传达到一定的强度后，那么热情的信仰者与口是心非的附和者之间就很难区分，权力拥有者也会对自己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产生极大的错觉，“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

当然，极权主义绝非仅仅靠着“宣传”就能谋取大位，而是存在各种复杂的“共业因缘”，如何审视它的起源，一直是20世纪



图为殷海光故居

的思想家们所致力方向。《**现代危机：政治学评论 1939—1962**》（曹磊 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版）虽只是一本专业学术期刊《政治学评论》的文章辑录，但如果考虑到这段时间内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这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可以大概猜到这本杂志当初所肩负的使命。正如编者为一本书所标定的关切，“人类存在的性质该如何理解？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能够了解多少？在一个遍布和我们一样的人类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极权主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虽然作者们观点各异，且互有争论，例如雅克·马里坦认为这是一种极端无神论的症候，并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精神现象，以反思极权主义而闻名的阿伦特也作如是观，但是沃格林显然认为，极权主义的精神谱系足可以回溯到中世纪的各种宗教异端。抛开这些学理上的分歧，对于这一群学者而言，显然最让他们触动的是20世纪的人类苦难，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才让他们投入到政治学的领域当中。相比起来，今日的政治学之“无情”，对人类苦难的“冷漠”，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在“人类的永生”中，雅克·马里坦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文明轻视死亡，那是因为它轻视人类，忽视人生的价值。如果一个文明号召人们耗费生命去追求商业利益、追求暴利、追求对别人的统治或者追求对国家的狂热，那么这就不是文明而

是野蛮。这种英雄主义就是野蛮的兽性行为。”

或许，这就是对极权主义最直接、最有力的批判。

在《甲骨文》的结尾处，何伟提到陈梦家的朋友巫宁坤，这位曾写下描述自己“反右遭遇”《一滴泪》的学者。当何伟问他是如何度过那段劳改营的残酷岁月的，巫宁坤说，“我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狄伦·托马斯。”“虽然我们在受苦、在被折磨，但死亡不能统治我们。”

在台大附近游走，终于找到了温州巷18巷16弄，这是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在这里曾饱受攻击，甚至妻子夏君璐都认为他在大病之后仍不停地劳作，其实表现出他在绝境下试图速死的心情。

在《**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世界文物供应社，1970年）中，我们看到一个曾经狂热迷恋西方生活方式的殷海光，开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但他的回归，绝非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摇身一变，如同川剧变脸式的廉价与俗套。在他的心中，不仅存在着对全人类与民族命运的深切责任感，同样对于个体的命运，他也同样投以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在故居里，我看到一封写给韦政通的书信，“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而独醒，内心常有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凄寒。寂寞之长途旅人，甚愿见路边之烟火人家，灵魂有个慰藉的小茶店。”世人常道殷海光待人严

苛,但其实他非无情,而是心中常燃光灼灼的火焰,只是这般真挚的火焰,常会在不经意间灼伤那些误解他的人。

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张尚德曾问殷海光,“老师,你将来要研究宗教吗?”殷回答道,“是的”,“不过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我的神不是有一个具体对象。而是爱、同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看起来,“五四”一代的佼佼者,最终又从科学走回到了宗教。

在台大校园里乱逛,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口黑色的钟指指点点,“哦,那就是傅钟!”突然间,不知出自何处的阅读记忆与

现实相逢,有了现实的载体,傅斯年与这所学校的联系,突然变得鲜活起来。王汎森先生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5月)中,将傅斯年的一生盖棺定论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他与殷海光二人,早年都以揭橥西方学术思想而闻名学界,但在晚年,都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文化,尽管他们所理解的传统文化都难免会沾染“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但这一反一复,是否也意味着当年曾掀起的東西文化之争,今日已再难以匆忙定调与盖棺定论?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2009年至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特别大河剧《坂上之云》。这部由司马辽太郎同名历史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通过三个年轻人讲述了从明治维新到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历史，在日本收视率一度接近20%，也吸引了许多中国观众。

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宗泽亚先生在日本搜集了大量资料编成《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6月），对这次战争条分缕析，说明“坂上之云”是如何升起的。

战争的胜负常被简化为武器的强弱，但是战争从来就不只是武器的比拼，更在于观念。清朝水师的舰船吨位、数量等都超过日本，战前舆论一度认为清朝必胜，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清日战争》第二章“清日战争观”，对比了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观念差异，比如俘虏观、军纪观、媒体观、科技观等等。仅以俘虏观为例，1886年，日本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在战争中对俘虏予以人道救护，而清朝则是公开悬赏敌兵首级，清兵习惯于就地处决俘虏，以便提着首级论功行赏。但是，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旅顺口，清兵虐杀日军俘虏，日军随即屠杀清国平民，让欧美记者为之震惊。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只在最后注明“参考及引用文献”，没有在文中一一注



明出处，功亏一篑。

1894年，清日战争之前，28岁的青年孙中山上书71岁的名臣李鸿章。这个当时无足轻重的细节后来不断被精描细画，甚至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孙中山不是“上书”而是“招降”李鸿章。黄宇和先生一一考证相关资料，推断孙中山没有见过李鸿章。这个考证并不让人吃惊，李敖早已著文指出这一问题。但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三联书店，2012年4月）里，黄宗和对孙中山早年的细节做出了全面而精微的考证，殊为不易。这些看似短钉之学的考证，却会让那些坚固的“宏大叙事”烟消云散。

这是一本“祛魅”的著作。一个伟人常

常有很多“小时候的故事”，用以证明伟人的“天生丽质”。对于这些“传说”的考证非常困难，因为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但是又极具价值，因为事关“神话”的存在与否。黄宇和用三十年时间考证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事隔百年，却有贴身调查之感。

台湾学者潘光哲著有《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可以理解为另一本“制作‘国父’”，告诉读者“国父”是如何成为“国父”的？这是对孙中山最好的致敬。对于一个现代的政治家而言，“神话”不是赞美，而是一种侮辱。同样，对于一个公民来说，生活在一个“祛魅”的社会，才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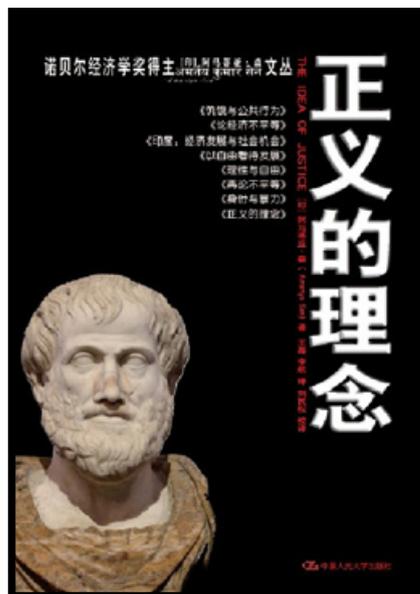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这样描述极权主义的宣传：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而是把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宣传；拒绝承认失业，同时表示不劳动者不得食。阿伦特的研究较为抽象，如果对相关历史缺乏积累，阅读会有些困难。美国学者兰德·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以作为参考。

这本书讲述了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宣传活动。对于极权主义，在态度上否定它并不困难，几乎人人可以做到，重要的是分析其中的逻辑。这本书没有止步于把宣传指为谎言，因为这样无法解释，为何群众会接受明知是谎言的宣传。极权主义下的群众常被屏蔽真相，如果他们接触真相，会不会立即

产生独立思考？答案并不乐观。举个例子，群众接受的宣传是元首和属下精诚团结，如果他们知道元首不断清洗属下，很可能不会震惊，而是释然，接受这种丛林规则。

按照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说法，群众已经习惯了“双重思想”，相信宣传，但没有把宣传当做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指出宣传是谎言，难以动摇他们的价值观。宣传制造的是神话，神话不是真相，群众对宣传的要求是完美，不是真实。神话离现实越遥远越具有魅力，尤其在现实极为无趣的情况下。

《弯曲的脊梁》分析了宣传的魅力，即群众为何会热爱乌托邦，哪怕明知是虚幻的。宣传往往和各种美德联系在一起，崇高得不可企及，“不可企及”有两种含义，既说明目标之高明远大，又意味着无需兑现承诺。《弯曲的脊梁》最后也说明了宣传的



失败，它无力使得群众全部成为“新人”，有时却让元首把宣传信以为真。

或许是因为明白了宣传的秘密，在柏林墙倒塌前夕，波特沃克访问东德，告诉熟人朋友，“东德在10年内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熟人朋友们称他是“一个美国式乐观主义者”，认为“至少要花50年时间才可能”。“东德的突然消失让每个人震惊，包括那些当它正在崩溃时仍然预测其稳定性的学者。”波特沃克这样回忆。

正义，人人所欲。但声称“正义”，未必能够证明自己就是正当的。在《**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阿玛蒂亚·森强调自己的思路有三个特点：

一、“就明显的非正义达成共识，而不是寻找绝对的正义”。围绕什么是“绝对的正义”，学者争得不可开交，但对眼前“明显的非正义”视而不见，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绝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明显的非正义”也是可以原谅的。阿玛蒂亚·森主张，对“绝对的正义”可以保持差异，但是对“明显的非正义”应有共识。

二、不仅关注抽象的“公正制度”，也要关注具体的“公正社会”。如果说“绝对的正义”是难以抵达的理想境地，是一个理论问题；纠正“明显的非正义”则是一个实践问题，完全有可能在当下做到。阿玛蒂亚·森并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他关于饥荒和制度的研究让人印象深刻：在民主社会里，从未发生过大的饥荒。但是，他的兴趣不在于讨论何谓美好的民主社会，而是怎样避免像大饥荒那样“明显的非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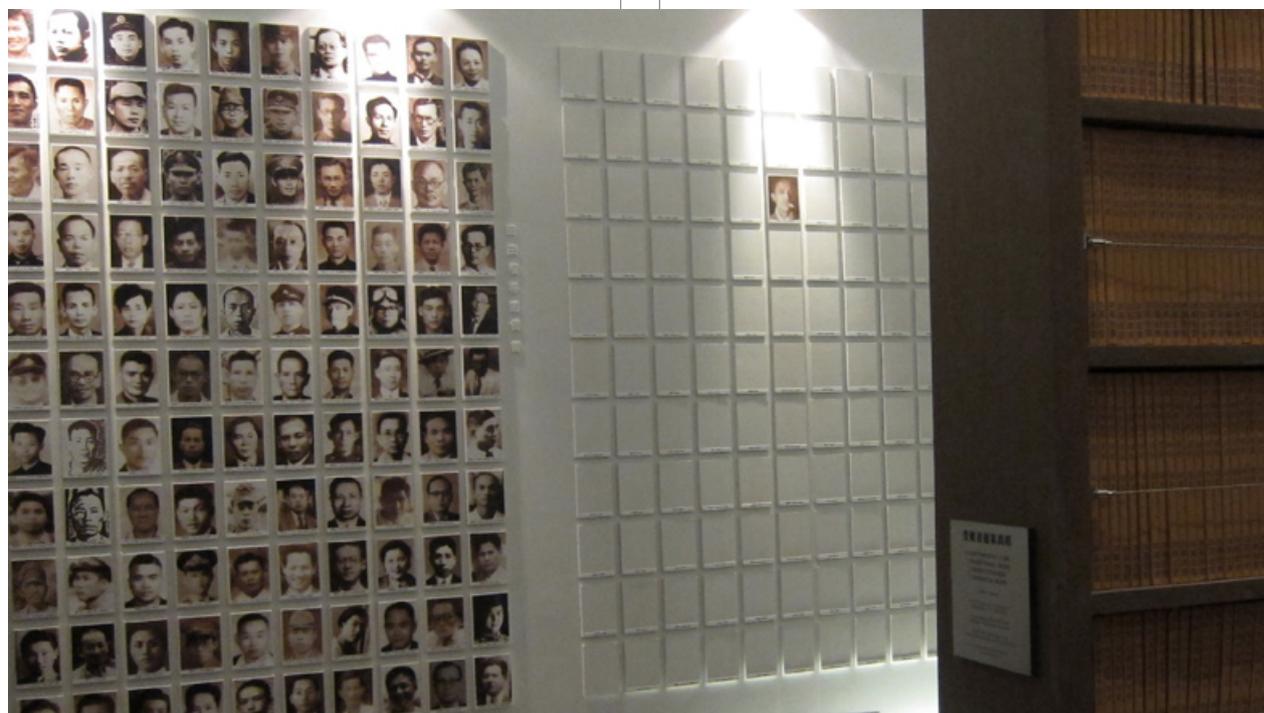
三、正义不能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需要有“全球性正义”。正义无法独善其身，否则非正义就会趁虚而入。在地球村时代，正义无法被分割为国家“内政”，比如一个国家的气候问题、经济问题、流行性疾病问题，都关系到其他国家，除非那个国家是极为封闭的。但一个封闭的国家，是否是正义的，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作为经济学家的阿玛蒂亚·森非常注重价值理性，行文没有同行常有的工具理性过剩的症状。除了《正义的理念》，他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身份与暴力》等同样值得一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



照片进入历史

特约撰稿人 汪伟 (上海, 2005wangwei@gmail.com)



在台北中正区南海路，有一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有着漂亮的、栗壳色的外立面，陶砖镶面，女墙用洗石子嵌出几何纹饰，正门立面呈半圆形，两侧翼楼向后展开。在日据时代，这栋三层的建筑曾是台湾教育会馆，高敞的内室常作为展览场所。日本投降后，这里一度用作台湾省参议会和台湾省议会的会议厅。美国在台新闻处林肯中心曾租借这里（中美建交后改称“美国文化中心”），用于办公和展览。80年过去了，风雨使陶砖的颜色更加黯

淡，更加增进了这种折衷主义建筑敦实朴素的风格。2010年，马英九宣布这栋建筑用作“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时，也是在这里，代表政府向事件中的受难者道歉。

纪念馆里有一堵照片墙，属于二二八事件中的死者。他们平和的眼神注视着展厅内的虚空——如果照片真的不只抓取一个人的容貌，也能够定格些许思想和灵魂，那眼前这些人物既无激愤之情，更没有挑衅的意思，相反，其中多是些平和敦厚的形象。那些没有留下照片的死者，照

图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片墙上给他们留下了空位：一格接一格的空白，布满了大半个墙壁，每一格空白，都代表一个死者。他们有的死于刑场，有的庾于狱中，有的消失得更加彻底——在公开的资料里，他们被定义为失踪人口。事变之后，死者和失踪者的家人和朋友，也大抵有一段艰难岁月。资料散佚，时间吞噬了历史的细节，他们留下的空白，可能永远无法填补。

时光磨圆了记忆的棱角，让陈旧的照片散发出感伤情绪，那情形如同翻看旧日的相册：我们的情感不由自主地被那些模糊的影像软化。但空白是不能软化的。和不断老化的照片相比，一格接一格的空白永远新鲜，永远凌厉，逼视着参观者。照片墙一旁，是一具档案架，架子上整齐地码放着牛皮信封。一只接一只，规格相同、颜色一致的信封，把木架子塞得满满当当。有一些文件被整理出来，陈列在橱窗里：和所有官方文件一样，各色官方陈述、密报和判决行文，镶嵌在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套语里，显得公事公办，抹去了办案者的全部个人色彩——这和照片墙给参观者留下的印象正好相反。

置身于照片和档案之间，参观者将被两种不同的经验拉扯。一边是标准化、刻板、没有个人特征的文字的历史，一边是发黄的照片或新鲜的空白构成了视觉的历史。每一张照片和空白都代表一个不同的人，当你与他们凝固的眼神对视，作为人的温情油然而生。正这一点温情，区分开

了文字和摄影，区分开了群体与个人，也区分开了历史规律与生活细节。

作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文字的历史建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视觉的历史不提供知识，而是为知识提供情境。你不能从照片上获知震惊世人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相反，曲折的事态演进被压缩成一张照片——通常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形象。这些人的形象如同历史河流中的浮标，它们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区隔开来，为冷酷的“历史规律”添加了人性，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性质提供了参照系。在快速推进的文字的历史叙事里，视觉形象预留了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我们将进入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那是历史之下的历史，是第二种历史——如同“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照片墙上凝固的目光，视觉记录的历史，只能称之为“个人史”。

这是“见证”一词的本义。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设想，真理部的某个分支将专门负责修改报纸。英社在革命成功之后进行了大清洗，革命元老除了老大哥之外，统统被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最后被处决的三位元老名叫琼斯、阿朗逊、鲁瑟福，党史里逐年逐月逐日地记录了他们的叛国罪行。然而，他们死后若干年，温斯顿在一叠等待处理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带有日期的纸片，是从多年前的党报上撕下来的，“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代表们的上照片，中间

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温斯顿感到害怕：根据党史的记载，照片拍摄的那一天，三位元老决不应该身在纽约。他们应该是地球的另一端从事卖国活动才对。

这张照片成了“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

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该出现的断层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温斯顿觉得，这张不该存在的照片存在于世，似乎证明“党对过去的控制”并不是那么牢固。他想，如果这张照片公布出来，也许党就会“化为齑粉”了。

在禁止言说的时代，文字的历史不断被修改，照片何以能成为漏网之鱼？看到



图为李振盛



照片若干年后，温斯顿的绝望没有减轻，反而加深了。在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无数人日复一日地忙着根据老大哥的需要和意志修改历史文献，原来的报纸被销毁，修改后的报纸重新印刷存档，而且，“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像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既然“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一张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也许人们会感到一阵茫然的晕眩，但经过真理部对历史逐时逐刻而事无巨细的篡改，人们将“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

但是，历史真的是“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吗？保留一张未经修改的照片，像温斯顿做过的那样，真的毫无意义吗？

李振盛曾经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派的身份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和他的同行一样，他经历了一个制度性导演照片的历史时期，并且深陷其中：从构图到用光，从人物的神态到墙壁上的一张招贴画，一切都是导演的结果。而在另一些场合，他的特殊身份让他在政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在街头抓取过一些有标志性的瞬间：旌旗招展的群众运动，高级官员在批判中受到体罚，以及佛教信徒手执侮辱自身信仰的标

语……摄影师本人的命运在运动中历经沉浮：他从批判别人起家的造反派，变成被别人的批判对象，又在林彪事件后重回报社。但不管在何时，摄影师都没有权力决定照片的用途。底片必须上交——这个要求与所有权和版权制度无关，而与温斯顿在密室中的奇遇有关。不管是导演的照片，还是抓拍的照片，在拍摄之前，照片的用途已经预先设定：在文字掌控历史的时刻，照片只是文字的图解，因此需要大量的修改加工，以清除那些与文字主题无关的细节。

未经修改加工的底片，充满细节的陷阱，可能让“对过去的控制”不再牢固。因此，要实现“对过去的控制”，就必须实现“对底片的控制”。而要反对对历史的控制，就必须反对对底片的控制。李振盛藏匿下来的大量底片，在2000年结集出版，书名“红色新闻兵”——这本公开宣布“未经剪裁”的摄影画册，重新利用了那些拍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底片。底片上未被修改加工的细节，编织了一个不同的历史：那是一个人没有上交的历史。

“红色新闻兵”，这几个字曾印在造反派李振盛的袖章上，代表着革命的组织 and 意识形态，如今印在画册封面上，其本义被书中的照片消解甚至翻转。要充分注意到这本画册与一些进入拍卖市场的“文革”影像的不同。“中南海摄影师”为政治领导人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些相当罕见，



因此频频在拍卖会上出现，但缺乏对底片来源（如何拍摄、保存、摄影师如何取得版权）和使用情况（曾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表，是否经过剪裁）的必要说明。没有这些说明，照片就只是文字的图解和附庸。我们或许应该视之为文字的历史的盲肠，以及廉价怀旧心态掀起的资本泡沫。

温斯顿曾经认为，一张留有日期的照片能够证明历史不可能完全被控制，但后来他觉得自己未免太乐观了。事实上，“过去不但遭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到最后，“供词已一再重写”，“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经毫无意义。”反过来说，要翻转被操控的历史叙事，就要找出修改照片来图解和美化历史叙事的机制。

几年前，在北京草场地的一间工作室里，艺术家张大力送给我一本书。在书中，一些曾经大量发行的历史照片第一次和原片排列在一起，引人注目的是两者之间显著的不同——发表的版本经过了大量修改，有些出现在原片中的人物，在最终发表的照片上消失了。

这些人物有刘少奇、彭德怀、博古……一长串名字，简直可以编一本失踪者的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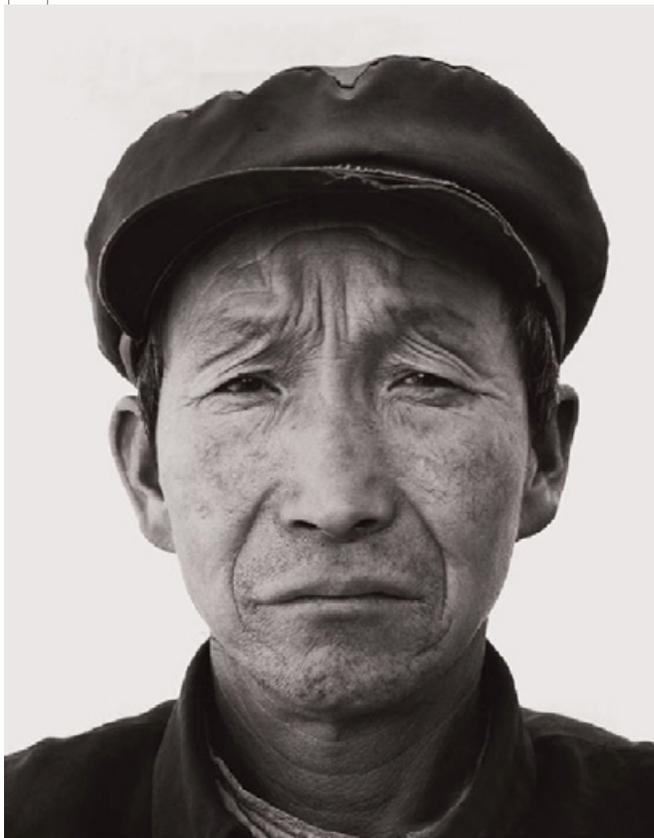
除了比较和展示，张大力没有做任何事：谁修改了照片？为什么要修改？修改的标准是什么？原片如何处理？对这些迅速产生的疑问，他未做任何解释。相反，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图片的版本学研究上。

篡改过的照片是不可能穷尽的。“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张大力的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说，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找到篡改过的照片并且展示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很容易就会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但这个工作有个福利：一个人从照片上失踪了——但他不会永远消失，寻找的过程如同寻宝，需要穿越一些象征符号构成的历史陷阱，最后找到的并不是刘少奇、彭德怀或博古，而是寻找者自己——他将清洗原有的历史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过去，并从中汲取评价当代和未来的智慧。

张大力用图片版本学构建了两条相映成趣的历史线索。我无意将两条线索看作二元对立的。摄影师在拍摄时，已经用大脑和相机对画面做出了剪裁。这种剪裁与暗房中的剪裁可能遵循着同样的标准和逻辑。当我们面对底片，并不是面对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一个局部和一个瞬间——连这样的局部和瞬间，也是摄影者挑选过的。视觉的历史是零碎的，不足以组织一个连续和完整的框架，去解释事件的因果联系。视觉的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但正因为人如此，这一历史不但可以比对，还可以质疑和补充。

黑明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师，他最有趣的作品已经结集出版多年，却几乎没





有引起任何反响。这些作品拍摄于距离延安市东南8公里外一个偏僻的山村。1903年，一个逃荒的农民在此地的山腰上开了第一孔窑洞。围绕这间被称作“新窑子”的窑洞，他的后代和陆续来此的移民繁衍了100年。黑明于1996年来到这里时，新窑子已经成为有数十户人家和数百人口的村庄。

经过八年连续的往来，摄影师被当作新窑子村的一分子，得到了村民们认可和接受。2004年出版的《100年的新窑子》，正是这八年交往和拍摄的产物。书中包含了简略的社会学调查、口述史和一大批风格独特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时间长，构

图为人类学摄影与黑明作品之间的对比

思完备，而且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讨论其中的内容。

全书的第一部分是村民的肖像照片，黑明和社会学家都将这些照片看作是“标准像”——这个词既指普通人用于档案的肖像照片，也用于特指政治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肖像。政治人物的标准像往往在宣布他们担任某一职务的同时向公众发布，因此也是政治仪式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标准像……是一件有着多么重大政治和历史含义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离普通人的生活多么远的一件事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说，“黑明这组农民标准像的冲击就在于，他





给那些似乎最没有资格照标准像的普通的农民拍摄了一组‘高质量’的标准像，而且不仅拍摄了，还以醒目的位置和处理手法印在了书里，并且以书这种媒介，成为公众阅读的对象。也就是说，它们和那些领袖们的肖像一样，具有了公共性。”

尽管标准像普遍地应用于政治仪式，但拍摄肖像也是人类学家进行人种学调查和研究时的常见做法。肖像照片的一个功能是为了强调拍摄对象的视觉特征，并用于将他们和其他人明显地区别开来。我们在翻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著作时，被拍摄者拘谨的面部表情多少暗示，拍摄中包含着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当黑明将这种风格应用于一个准熟人社会，也仅仅在部分程度上消除了拍摄对象的拘谨和不安。

在孙立平的描述中，拍摄“高质量”肖像是一种特权，只有重要政治人物和城市居民才有这种机会。显然正是为了消解这种特权，黑明选择了大画幅相机，而不是那种容易把摄影师隐藏在拍摄对象中的小相机，来为新窑子的村民拍照。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仪式感造成了一种和

100年前的人类学家类似的困境（他们普遍使用大画幅相机，通常是一个和三脚架连在一起的木箱式构造），由此带来的情绪压力让拍摄对象变得紧张。这种情绪作用于拍摄对象的面部肌肉，造成一种常见的拘谨表情。大画幅底片和高精度镜头夸大了拍摄对象的肌肤质感，往往让读者误认为，拘谨的表情并非特定场景的压力所致，而是拍摄对象的日常特征。

如果说有什么最终软化了拍摄对象的表情，并重新调整了拍摄者和村民的关系，正是文章的第二部分，也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表情生动的抓拍照片与口语穿插在一起，共同编制了一个小村庄的生活史。

经过文字记载，书中的口语损失了口音和音调这些丰富的细节，但即便如此，其弹性和灵活足以让读者去揣摩照片上的人物，揣摩他们的经历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的体态、表情和面对镜头时的反应产生了何种影响。随着这种不可遏制的观看方式，视觉的历史也不可遏制地进入了文字的历史。📍



畅销书是怎样炼成的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日本出版萧条二十年，多少百年老店湮没无闻，多少新社倒闭复“更生”（指破产出版社根据《会社更生法》，在重新调整股东和债权人关系之后，复以原公司名重新登记注册，但法律上已是不同的法人。如著名出版社草思社），却已面目全非了。“一地鸡毛”中，幻冬舍的崛起，诚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迹。而这种奇迹的出现，端赖一位“病人”——编辑家见城彻（Toru Kenjo）。此人患了一种疑难杂症——“编辑病”。用病人自己的表述，就是“书籍若无法畅销，便失去出版意义”。作为一种出版理念，是耶非耶，姑且不论，这确是见城其人奉为圭臬的出版原则。他一路折腾，打造畅销书无数，成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制造商”。

见城彻1950年出生于静冈县。从小有严重的自卑情结，“直白地说，那时我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其貌不扬的。……我当时体弱多病，个性又阴郁孤僻，在班

上总是受同学欺负”。小学六年级时，一次与某女生擦身而过，因手指甲不小心勾到对方的裙子，便被冠以“好色卷裙男”的绰号，见城深感耻辱。上了中学，虽然情况多少有所改观，但绰号变为“章鱼”，同样苦不堪言。成年后，他去寿司店或意大利餐厅，绝对不碰章鱼和乌贼。

人总是缺什么想什么，弱男拜强者。见城买下八卷本《海明威全集》，反复研读。直到成年后，一直把收录于全集第一卷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胜者无所得”当成座右铭。对卷首的题词更是没齿难忘：

“与其他任何争执和战斗不同，胜利者就是一无所获——不仅不给予胜利者宽适和喜悦，也不赋予荣耀，甚至在赢得胜利的同时，也不要让他得到任何回报。”受海明威的影响，他认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没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在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十年中，几乎每天做重量训练，一周只休息一天，硬是把自己塑造

成肌肉男。一度中断训练，后又恢复。在日本文人中，见城大约是唯一能与三岛由纪夫对抗的健美选手，而两人的动机亦不无相似之处。后来成立的幻冬舍的社标，是一个投标枪者的图案，据说原型就是见城彻本人。对见城来说，“高中时代的格斗至今还在持续着”。

大学毕业后，在七八家志愿的出版机构中，只有专门出版实用生活类图书的广济堂录用了他。就这样，见城成了一名策划编辑。他属于那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编辑，认为凡畅销的内容产品（无论是书籍、电视节目或任何传媒），须具备四要素：原创性、浅显易懂、与众不同和感染力强。回过头来看，他在广济堂策划的第一本名为《公文式数学的秘密》的实用补习考试用书，恰恰符合上述条件，见城开始觉得卖三万册不成问题，不成想居然销售了三十万册！

旗开得胜的“新米”编辑，踌躇满志，开始谋划小说出版。作为资深文青，见城自然也有过小说创作情结。但结识了一些后来获得芥川奖、直木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小说家后，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他感觉自己没有小说家朋友们身上的那种与整个世界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必须借助文字的力量来自我救赎的强烈激情。于是，转而“想要成为刺激这种作家的触媒，希望帮他们策划文艺作品，如此热切的想望深深召唤着我”。

旋即，跳槽到以小说出版见长的角川书店。最初负责的工作是将森村诚一在社办文艺杂志《野性时代》上连载的小说



《人性的证明》集结成书。该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即《人证》），总销量逾四百万册，堪称一本超级畅销书。巨大成功的最直接结果，是“病症”加剧，“编辑是要跟作者精神私奔，既然是私奔，去向就只是地狱，不会是天堂。可是，对于表达来说，地狱却正是黄金之地，所以简直是被分裂的一天天”；“把悲惨变成黄金的瞬间，我就在那诞生的地方，那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陶醉境地。这就是编辑的准确的病症之所在。”

真正让见城“领悟到文学世界的悲惨和富饶”的，是与小说家中上健次的交往。中上是战后出生的作家中，第一个获

得芥川奖的人，但跟见城编辑每天晚上在银座喝酒时，尚未成名。直到有一天，中上突然来电话，张口向见城借三十万日元，并发誓“我若得到芥川奖，再用奖金还你”时，见城才知道芥川文学奖的奖金是三十万日元。原来中上是在店里醉酒闹事，打伤了客人，对方提出愿以三十万日元私了，否则就报警。见城见状，二话没说，带中上直奔银行，把原打算新春到纽约旅行的川资取出来，交给中上。后中上果不负众望，荣膺芥川奖。得奖后第一件事，是来到见城的会社，把自己关在编辑和作者校对用的房间里，整整两天两夜，写了八十枚稿纸的小说《荒神》，交见城任总编的《野性时代》发表。“在天刚亮的校对室里，我们两个互相握手，并以微温的啤酒干杯。”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第三天一早，中上打来电话：“我现在就去找你，先别去上班，等我一下。”两小时后，中上出现在见城的公寓，刚进门，便很霸气地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大叠钞票：“谢谢！我按约定把三十万元拿来还你。”见城从钞票中抽出五万元，然后两人出去喝酒。“那家位于新宿区公所大道上的酒馆白天也营业，我们是那儿的常客。”哥俩边喝酒，边谈小说。“梯子酒”喝到第五家店的时候，天空泛起了鱼肚白。中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他欠身坐进车里，还生气地大声对我嚷道：‘喂！我没有出租车资啦。’话音刚落，我赶紧跑上前去，把一张万元钞票塞在他手里。我对这一切感到无比满足，打心底希望这种日子可以永远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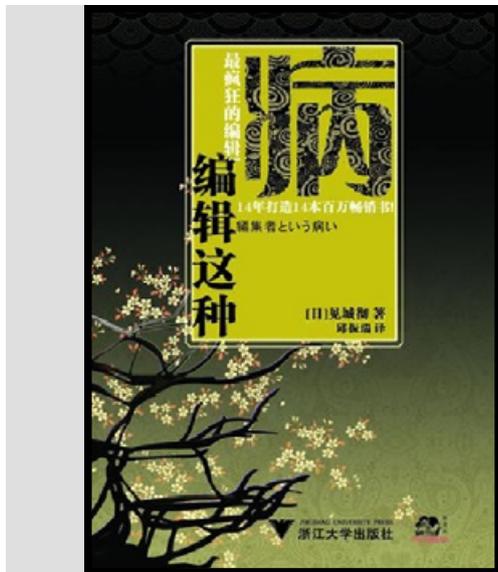
下去”。当时，见城彻二十五岁，中上健次二十九岁。

如此浓密的日子，并非编辑与小说家所独有。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见城都会在西麻布的一间叫做“Purete”的酒馆里与音乐人坂本龙一对酌。“明知没有出口，我们还是每夜去那里报到，借酒浇愁，然后随着早晨的阳光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可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又开始寻找看不见的出口，迷失在从西麻布往广尾的街道中。”

坂本接下为好莱坞电影《末代皇帝》配乐的项目，同时参与该片的演出，出发前往中国。“然而，他似乎怎么也没办法喜欢中国。他说自己和那里的土地不亲，电影制作过程中，只要稍有空当，便返回东京。一到成田机场，他便打电话给我，和我约在西麻布碰面，最后再到‘Purete’喝到天亮。”

彼时，见城当《角川月刊》的总编辑，拉坂本龙一写专栏。交情在那摆着，坂本难却，便一月一篇吭哧吭哧地写，一写就是五年。原本发行五千册的刊物，竟膨胀三十倍，变成月平均发行十五万册的畅销月刊。而对坂本的诸如开设私人经纪公司等事务，见城则当成是自己的事情，为之奔波，责无旁贷。《末代皇帝》公映后，大获全胜，一举拿下十二个奥斯卡奖。那个电影的制作班底，包括导演贝托鲁奇和坂本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性恋。结果，害得陪同坂本赴美出席奥奖的颁奖典礼的见城也被当成了“同志”，经常被娱记问道：“你是坂本的伴侣吗？”

如此，见城广交作家与各界名流，开拓稿源，打造畅销书无数，在社内和业界建立了相当的声望，四十一岁，成为角川社的董事，“角川的见城”是含金量极高的名片。日本出版业的行规是，编辑跟作者吃饭，约定俗成由出版社埋单。见城在角川呆了十七年，是交际费花得最凶的编辑，不仅酒钱，连作者酒后的出租车费，都是见城掏腰包。“但事实摆在眼前，我也是最替公司赚钱的人，公司也认同我的做法，从来不对我罗嗦。”



《编辑这种病》
(日)见城彻 著 邱振瑞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6月版

然而，如此成就斐然的出版家，终于在四十二岁时（1993年11月）让自己“归零”：从角川离职三个月后，与五位同道注册成立了一家新出版社“幻冬舍”（社名为作家五木宽之命名）。虽然不少企业表示愿意出资，但见城一一婉拒，只以个人的一千万日元储蓄作为资本金来维持运作。第一批付梓的书是六种单行本。见城突发奇想，在《朝日新闻》上打整版广告，广告费用高达六千多万日元。业绩为零的无名新社，在宣传上如此巨额投入，连报纸的广告业务员都担心风险。可见城对广告人员说：“幻冬舍若无法支付的话，我会自掏腰包付款，请上这个广告吧。”这时，所谓“角川的见城”的业界名头无形中帮了大忙，印刷公司的社长表

示，印刷费可以迟付一两年。“有他们的付出和鼎力相助，让我真切地体悟到独立门户是正确的选择。”结果毫无悬念，开张大吉：六本书全部打响，登上各大书店的畅销榜。

见城并未“见好就收”，公司创立第三年，又进军文库本（即口袋版书）市场，竟一口气推出六十二种新书。何以偏偏是有整有零的六十二种呢？因为十五年前，光文社曾斥资六亿日元，推出三十一一种新书构成的文库系列，此后十五年间，几成绝响。“因此，我便投入双倍的资金，斥资十二亿元，首发六十二种新书。”见城的想法，借用其新事业首航时的宣传文案，就是“如果不敢在新的创意上冒险，你还能妄想改变什么呢”？如此大手笔，自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玩法。但见城平生最鄙视的就是上班族的所谓“常识”——“工作顺遂的时候，我便开始怀疑一切”。若照出版市场的“常识”，幻冬舍创立的1993年前后，正是所谓“出版大崩溃”论甚嚣尘上之时，而且，幻冬舍定位的文学与文化，是整个书业中最动荡的板块，这更是彻头彻尾的无视“常识”之举！用见城自己的表述，叫做“破除世界行规，超越编辑常态”。

然而，正是在书业最不景气的时期，凭着见城彻其人的敏锐的嗅觉、广泛的人脉、精准的学术定位及一个少而精的

高度专业化的编辑和营销团队，幻冬舍居然在逆境中启航，一路“逆风飞扬”：2003年11月，出版社成立满十周年时，在日本创业板JASDAQ上市。截至2007年，创业十四载，共出版了十四种百万级畅销书，创造了日本出版史上难以复制的奇迹。

幻冬舍特立独行，后来居上，其动静之大，确乎超出了历来以保守著称的日本出版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想象。据《朝日新闻》2009年5月报道，幻冬舍一名财务人员利用擅自涂改赊销票据的手法，非法侵吞公金，八年间竟多达9.1亿日元。而彼时，照日本书业专家李长声先生的说法，这家新锐出版社仅有员工六十人，资本金才三亿余日元（见《日下书》，世纪文景2009年3月版，第81页）。这在今天的日本，是严重的贪污事件。对东洋文化事情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日本出版早已进入微利时代，锱铢必较。一名经理居然能贪污逾资本金三倍的公金，且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未被察觉，在暴露出管理问题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幻冬舍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换一个社的话，早倒闭几回了。

当然，这毕竟是负面新闻，在见城彻的回忆录日文版初版的2007年2月，事件尚未被发觉，见城自然也未提及——此乃题外话了。Q

从工人运动视角观察中国社会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当裴宜理在1988年利用华盛顿大学的学术休假年撰写《上海罢工》一书时，她不得不在导论中即对“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做出反驳。由于对20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而备感失望，这些学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更早一些持左派立场的工运研究者片面强调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论调加以冷嘲热讽。这一派观点看来在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已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裴宜理不得以防御性的口吻申辩道：“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为。”

对于这些新潮工运研究者的质疑，还反映在裴宜理为考查中国工人运动所选择的典型的工人集体行为——罢工上，尽管那些新潮工运研究者早已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更多地去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但在裴宜理看来，罢工仍然是研究工人政治的最佳途径，因为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可以进行的努力”。当然，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罢工，也是因为有关上海罢工的资料丰富而相对完整。裴宜理充分利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富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上千件老工人的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都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但所有的史料都会因为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差异而发生变化，这些资料抖落历史的尘埃，

如今却成为裴宜理力求客观呈现上海那一段工运史的绝佳佐证。

实事求是地说,《上海罢工》的确胜在对于史料的收集和运用,这使得这部副标题为“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著作出人意料地具备了一般是历史著作才具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在书的第二部分论述党派政治对于上海工人运动的介入和缠斗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的线头繁杂而模糊,但在裴宜理条分缕析地编织下,一幅精雕细刻的历史画卷得以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另一方面,和同类的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研究著作相比,一一比如西方研究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泰斗查尔斯·蒂利发表于1974年的《法国罢工》一一,《上海罢工》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上还稍嫌不足,书中经常性地引述查尔斯·蒂利、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观点即是明证,对这些观点裴宜理很少做出辩驳,而只是作为自己观点更强有力的证据。比如在书的第一部分论述地缘政治对于工人反抗行为的影响时,裴宜理写道:“查尔斯·蒂利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裴宜理构筑全书第一部分的核心观念。当裴宜理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她又是通过蒂利的论述,从理论上探讨“技术”一词的主观属性:“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尽管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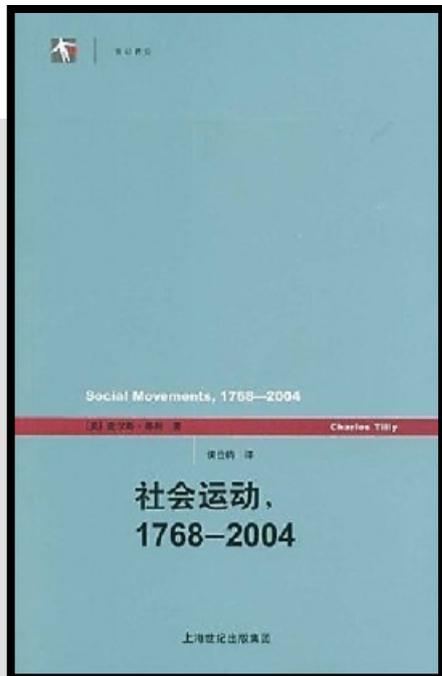
《上海罢工》
(美)裴宜理 著 刘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经历和聪明都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技术最终并不取决于单个工人的特征,而是取决于工人与雇主的关系。”

裴宜理以蒂利等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名家的论述作为建构自己著作的理论基石,其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自身理论素养的不足(光有扎实细致的案例显然还不足以支撑起一部学术杰作),另一方面这也是聪明的选择,使她能够腾出手来在颇费周折获得的珍贵史料中一展身手。上世纪前半叶的上海滩实在称得上是光怪陆离,英法日等外国殖民者、青红帮等帮会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党势力,加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权,各擅胜场各行其是,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这种复杂的局势自然也渗透到工人运动中,而

且工人本身的祖籍、文化、性别，所从事职业的不同所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也在增加着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书的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即令人信服地从广州移民、宁波移民和苏北-华北移民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工人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他们日后在城市的生活，包括以罢工为最显著特征的政治生活。主要来自广州的木匠和主要来自宁波的铜匠被统称为来自南方的工匠，他们工资较高，文化程度较高，他们的行业意识和阶级觉悟也相应较高，因为“他们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来源于丰富的组织与社团经历，那可是工匠文化的标志”。工匠们开始加入新的政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阶级阶层划分的行会。而主要来自苏北的非技术工人（以纱厂和码头工人为代表）则采用更有节制的罢工方式，斗争带有防御性的特征。

裴宜理还将中国工人运动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中叶，她的用意很简单，就是突破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将中国工人运动纳入党史范畴的做法，事实正如裴宜理强调的那样，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前，中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只是在这个前提下，裴宜理指出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而政党政治则在其中充当着催化剂的作用。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他们都相信工业化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都花费巨大精力



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到自己的政治旗帜下。这一段上海工运史，由于以往学者的辛勤探索而轮廓毕具，裴宜理则希望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试图揭示出这一段上海工人罢工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上一代左派学者观点的褊狭之处。除了1924年到1927年这一段蜜月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两股势不两立的势力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由于他们都对工人阶层特别重视，在这一领域的角力也就格外惨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之争，是深埋在上海工人罢工这一社会表象之下的底色，在这中间，青红帮又作为一股见风使舵的势力将局面进一步复杂化，而国民党内部军统和中统之争也

反映在工人运动中。

裴宜理以不亚于史家的细致笔触描画出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图景，但她更想表达的是，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运动的实际，一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比如认为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工人中更能站稳脚跟，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发展势力——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实情，都经不起细加追究。那是一段令人目眩的上海滩历史，读者通过各种书籍各种角度都多少触及过，但是像这样从工人运动的角度触及这一段历史还是会让人备感新鲜，正如裴宜理指出的那样，强调共产党和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对后来的中国历史显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裴宜理在政党政治这一部分如何立意求新，她只是在既有的一大堆材料中整合出一些尚算新鲜的思路而已，就《上海罢工》这本书而言，真正的新意在于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在这部分，裴宜理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这部分著作充分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和长处，裴宜理利用中国1980年代刚刚出现还未被西方史学界系



统吸收的材料，勾画出上海20世纪上半期工人运动的微观图景，因为是微观的因而也是具体而生动的。作为对较完整的行业罢工事件的描述，其中必然涉及导致工人之间差异的地缘和政党因素，只是这二者不再被从事件中抽离，而是被裹挟在事件中作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时也作为观察的视角。罢工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就上海罢工而言，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的。

在书的末尾，裴宜理将这种延续性观点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企业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在许许多多方面，它延续着“旧时代”工业及其行动主义的特征。全书结论部分最后一节《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中，有许多令人期待的观点——比如建国后社会主义企业和解放前的工匠行会之间的比较和联系，建国后国家对工业和工人的政策的源流等等——尚未展开，也许那正是裴宜理计划中的有关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二卷将要面对的问题，在这卷中，裴宜理将要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其中，裴宜理特地描写了1967年，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长发迹的王洪文等造反

派对从前的中共地下党工运组织者，后来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的张祺（曾领导1934年美亚丝绸公司工人运动）发起的一连串进攻和羞辱，一种可怕的历史循环论几乎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本《上海罢工》不是满足读者好奇心的传奇故事，它富有生命力的根须早已伸展到我们此刻的生活之中，带着它持久的活力和晦暗。裴宜理实际上是交给我们一把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从工人运动的视角，以它自身的复杂性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而当我们急于沿着社会的裂纹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时，她似乎又在告诫我们：“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独立小书店的死与生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帕拉阿图, fredyan@gmail.com）

在香港旺角的序言书室做了一场关于香港书店之于香港文化深意的讲座，散席后和书店小老板闲聊，话题自然扯到了即将在香港开幕的台湾诚品书店。小老板忧心忡忡，独立小书店常常惨淡经营，维生不易，现在又加上诚品的高调进入，一下子租下了铜锣湾繁华地段三层楼4000多平米的面积，又是展览，又是通宵营业，以此来瓜分香港本已就十分狭小的阅读市场。大型书店的侵蚀下，香港独立书店的明天，又该何去何从？

诚品书店创办于1989年，其名字来源于古希腊文eslite，意指精英。诚品自

建立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激发创意与阅读、推广文化产业，从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发展成为台北的文化地标，用飘逸的书香带领台湾找寻浮躁年代中的人文情怀。2004年，《时代》杂志更是把诚品评选为亚洲区一个旅游必访景点。台北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凌晨三点加班结束，离早晨上班时间又只差短短的几个钟头，这个时候走进诚品，要上一杯咖啡，翻翻书，打打盹，会找到一份归属感。

比之名声远扬的诚品，香港的书店似乎就多少显得默默无闻，不过香港也有自己的特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



图为香港诚品

那些“二楼书店”。

香港的“二楼书店”起于1950至1960年代，于1970年代逐步发展。当时香港正深受国际“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反殖意识强烈抬头，1971年的保钓运动、1975年的爱国反霸运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香港知识分子主动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反思，试图从理论层面对社会动荡给出解答。另一方面，在六七香港左派暴动之后，港英政府也开始逐步改变管治策略，通过注重地方社区建设、鼓励艺文活动积极弥补与香港民众的距离，着力培养港人安居乐业的本位意识。社会开放的气氛渐次孕育出有利条件，新一代土生土长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他们摆脱了上一代的流亡放逐意识，自觉出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并主动去追求自我定位和都市发展，而抗拒教条和老套。这种带有个人性质的追求努力，在知识分子文化思潮的牵领下，在媒体传播如报纸、杂志、电台、电影与民间组织的推动下，慢慢汇聚成大众的文化追求和品位，继而又演变成一代香港人的文化根基。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事后：本土文化志》一书中所说，“1971年到1981年是香港文化脱胎换骨的时期”。自然的，以文艺思想、社科学术类书籍为主打阵地的各种楼上书店便成为了香港早期知识分子最好的聚散地，并承担起社会开蒙的媒介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香港独立书店的代表，一间是青文书屋，一间是曙光图书。这两家书店同藏于湾仔庄士敦道一

座旧楼单位里，一家售卖中文图书，一家售卖英文图书。

青文书屋就是青年文学书屋之意，源自于由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文学社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奖。当时部分得奖的学生毕业后，希望把办文社提倡文学的热情承传下来，于是合股创办了青文书屋，而曙光则由香港“二楼书店”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国明一手撑起。由于青文、曙光所收书种的鲜明思想和人文特性，例如那时还难以在其他地方寻觅到的新左派、德里达、福柯和本雅明，以及各种手制的小型独立艺文刊物，如《工作室》、《女风·流》、《病房》、《前线》、《越界》等，这里很快成为吸引香港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汲取知识、结交同道并分享各种前卫剧场、讲座演出消息的一个文化标志性场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学术及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吕大乐、陈冠中、梁文道、刘细良、马家辉、昆南、朗天等，都曾经是当年青文书店里孜孜以求的常客。

1988年，罗志华接手青文，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8年之久的书屋小老板之路。在罗志华一己之力的推动下，青文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成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并在“一人主义”的经营哲学之下（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一人搬运），出版了许多今天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旗帜人物（譬如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也斯、黄碧云、谢晓虹等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经由青文出

版。此外，很多没有市场的香港本土文学书、学术书亦都得到了青文协助出版，并成为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的常客，罗志华也由此被赞誉为是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

然而伴随着香港政府对于湾仔地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青文书屋不得不直面生存与死亡这个残酷的选择。在过于的二十年间，湾仔由过去充斥着大牌档、杂货摊、戏院的市井地，逐步发展成为向世界展现香港的一个窗口。湾仔的旧区，重建项目一项紧挨一项地繁荣登场，直接导致该地区楼价的飞速攀升。特别是到了2005、06年，房地产市道伴随着香港经济强劲复苏再次大幅上扬，与青文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曙光在难以维计下又宣布退出，使得青文更加独臂难支，只能于2006年8月无奈地宣布结业。结业后，罗志华将所有库存图书搬至大角咀一个仓库内，期待有朝一日重开青文。但2008年春节前的一宗不幸意外，罗志华在书仓整理书籍时，被二十多箱塌下的书籍活埋，失救而死，青文遂变成永久结业。

爱书人死于自己所心爱图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这份凄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笼罩在香港本土文化人的心里。用梁文道的话说：

“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青文的盛与衰只是香港“二楼书店”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这几年关门的“二楼书店”，知名的还有阿麦



书房，而依旧留守的，则将书店逃亡至租金更加便宜的楼上楼，苦苦挣扎着。而资本雄厚的大型出版集团，却可以依托成熟商铺地段的天然优势，以及庞大的发行网络和物流优势，进行多元化经营（譬如广州的方所就将服饰、设计和图书三者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生活美学馆），再通过邀请知名作者举办讲座以吸引人潮，扩大影响和销量。

但实际上，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两者之间并不是零和的游戏。诚品高调进入香港，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激发起香港人对书店的关注，而诚品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也会极大地推动本地阅读风气的逐步形成，进而从整体上扩大香港的阅读市场，形成一种增量放大效应下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同涨的局面。另一方面，大型书店难免媚俗，摆在柜台最前方的永远都是畅销类书籍，而独立书店则更加偏爱文史哲等学术人文类书籍，同时也附设有二手图书寄卖服务，自印刊物交

流活动，并和当地的社区网络、读书沙龙紧密相连，俨然是一片爱书人精神上的绿洲。譬如我就曾在序言书室买到过陈智德的《抗世诗话》、周绮薇的《推土机前种花》等关乎社会运动、本土文化的小书，而这些看上去属于小众的读物在大书店里都难寻踪影。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独立小书店可以起到特色经营、细分市场的作用，当然前提是香港阅读市场这块蛋糕要继续做大。Q

波士顿情书之九

今夜有雨一起裸奔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X, 一来波士顿, 我就闻说哈佛学生有三大传统: 在图书馆书架后做爱、对着老祖宗约翰·哈佛的塑像撒尿以及午夜的“原始尖叫”, 前两个传统随机性与私密性太强, 因此也只能在闪烁的口耳相传中捕捉到它的影踪, 而一年两次有组织有规模有观众还有啦啦队的“原始尖叫”则不然, 时间和场所都固定, 且有着日益发扬光大为大型露天party的趋

势, 这让我足够从容地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家二手店里, 慢慢淘上一个羞涩的单反做为最新装备, 一路叫嚣一路挥舞着去哈佛校园观看“原始尖叫”。

1.

其实 所谓“原始尖叫”, 其实就是午夜裸奔。在每个学期结束、考试开始之



图为哈佛裸奔现场

前的那个星期的前一天午夜，学生们聚集在哈佛校园里集体裸奔上一圈或是两圈，据说以此来缓解考试压力。当然，有此类减压传统当然不只是哈佛大学，比如布朗大学，每个学期结束之时，就有一群学生裸体行走在各个图书馆，给学生们散发甜面圈吃，以缓解压力。而在MIT，学生则从楼顶扔下旧钢琴以缓解压力。不过，最有趣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自1970年代开始，每年第一场大雪落下之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便在校园里举行“裸体奥林匹克”，哪一队裸体出场的人多，那一队就赢。1979年男女同校后，男女学生们共同继续发扬光大此传统而让学校声名狼藉。不过糟糕的是，1997年的时候，普林斯顿竟然没有下雪，于是专属二年级学生专利的裸奔就那么悲催地cancel掉了。第二年下雪的时候，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不甘心，要补回行驶裸奔的权力；而此时二年级的学生当然也不会放弃，结果导致这一年裸奔人数暴增，校园里的花草草遭到严重地蹂躏，不雅的照片更是大规模流地在网上传来传去，结果给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00年，校方因安全原因禁止了这项活动。不过，在我对比多所学校的传统之后，发现最为盛行的解压传统方式依然是午夜裸奔，如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塔夫茨大学等都有此传统，而以哈佛大学的“原始尖叫”最负盛名。这让我充满了期

待。X，你知道吗？听说我要去哈佛校园看裸奔，一同在教会学习《圣经》的朋友都笑而不语，我全当成是嫉妒来理解，依然神灵活性地在学完《圣经》后，招摇地冒着大雨去哈佛校园围观。即便一位朋友郑重警告我，就在前一天晚上，哈佛校园发生持枪抢劫案，在我看来也只是增添了独行侠我此行的浪漫与刺激。

然而雨真大，一直比我还兴奋地下着，这让我有些失望，因为我不止一次有些恶毒地盼望下大雪，以提高裸奔的难度和我的兴奋度，结果只是盼来我来波士顿之后遇到的最大的一场雨，而且冬雷震震，有些燥热，天气预报说将近有十度，这在纬度相当于沈阳的12月的波士顿有些罕见。不过，我还是早早就出发去了哈佛大学，先是在一个朋友住处休息，快到午夜时才踩着点过去，然而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一手打着伞一手护着单反，梭巡着即将上演的惊世骇俗的一幕，然而十分钟过去了，校园里依然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于是又在外围梭巡，依然只有三三两两穿戴得很严密的同学经过。我正要彻底否定自己的信息时，突然看见一位台湾朋友领着几位女生也穿梭在雨中，于是连忙与他核对信息，时间地点都没错！？

雨依然很大，我的裤腿管儿全湿，于是跑到有着“哈佛大象”之称的怀纳德图书馆的大柱子下避雨，刚跑上去，便听到小号小鼓小喇叭声在不知处的地方响

起，于是连借来的破伞都来不及再撑开，我便拔腿寻声飞奔而去，此时我的手机显示时钟是11:59了。这我不禁大呼，裸奔的同学也真准时。跑过一个庞大的建筑，便看见刚刚还寂然的校园，突然就冒出一草坪的人，最显眼的还是哈佛雕像前那群穿着猩红校服的乐队。一位指挥男已经爬上了约翰·哈佛塑像上，站在约翰·哈佛牧师身旁指挥着下面半裸的乐队：所有的乐队成员都只上身穿着西装，下身则只穿着内裤；在校园斜对角处，今晚的裸奔主角们正包成团一起高呼：“哦嘞嘞，哦啰啰，哦嘞哦嘞哦嘞~~~”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气氛达到了真正的白日化——有白色的蒸汽从那一团团肉身中升起，足足好几分钟，直到

突然开跑。我几乎还没反应过来，便蔓延出长达十几米的裸奔队伍，这让我非常惊讶抱成团的能量了，怎么藏了那么多人在中间。

实际上，许多裸奔的同学很害羞，一直到最后开跑了才去除最后的武装，当从我身旁跑过时，几乎目不斜视。当然，也有泰然自若的，甚至停下来摆pose让旁观者照相。晚起步的同学还只跑一半，前面的同学已经到达终点。雨依然下着，这让他们不得不赶紧穿衣服退场。我那不争气的单反还来不及闪上第二次，裸奔的同学竟然一下就消失了，校乐队也只是再持续了半首曲子的时间，便如来时一般神秘地消失了。只有兴奋的雨依然下着，还有兴奋的我站在雨里，浑身湿透。



图为校乐队助阵

2.

据哈佛学生档案记载，第一位在哈佛校园里裸奔的学生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弟弟查尔斯·亚当斯。1785年15岁的查尔斯入学哈佛，不久就因和几位朋友喝醉酒在校园裸奔而遭到惩处，不久又重新入学。不过，当时他的父母最担心的不是他的酗酒问题，而是“喜欢与他的父母讨厌的男人们一起鬼混的倾向”。15年后的1800年10月，他的母亲去纽约看望他，没想到期待中的幸福家庭变成“躺在病床上的查尔斯已无家可言，只是靠朋友供他一个栖身之地”，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早已离开了他。之前，他早已破产，沉溺于酒精之中。一个多月后，查尔斯死于肝硬化。对于自己的这位浪荡子，有着“美国之父”之称的约翰·亚当斯在1798年便发誓，再不见自己的这位儿子。这位父亲信守了自己的誓言，直到查尔斯去世也没有去看一眼。不过，今天在哈佛校园里裸奔的同学，可不是发端于这个被自己父亲看做是“被魔鬼占据的疯子”的查尔斯·亚当斯，而是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

1964年，以独立、思想著称的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了波士顿附近的私立大学布兰戴斯大学里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的一本书；同年9月14日，在美国另



一边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爆发了一场“自由言论运动”。起初一两年，这两件事并无联系，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咆哮而出席卷全美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时，这两件事几乎成为人们回忆“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两个坐标。在伯克利校园里，学生们与学校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学生权力”——第二年1月2日，校长斯特朗辞职，马丁·梅尔森接任，宣布学生可以在斯普卢尔大楼的台阶上集会，不受限制地摆放桌子。自此，学生要求的权力远远超出了校园，如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所说：“带头反对越战的是大学，逼使约翰逊总统下野的是大学，率先在污染问题上同大

公司展开斗争的是大学。”此时，伯克利大学校园已成为了青年造反学生们朝圣的“麦加圣地”，而他们手上拿着的便是那位德裔美国教授的书——《单向度的人》。当时的《华盛顿邮报》这样报道着这位大学教授的上课情形：1968年“秋天的这些日子，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150名一年级的青年学子蜂拥着去听一位70岁老教授的演讲。他的哲学是学生应该打倒现存社会。这位教授就是马尔库塞。”他的《单向度的人》则被青年学子们当做了“造反运动的标准教科书”，至1969年3月，已用16种语言出版过10万册，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四十年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书。不过此时，在布兰戴斯大学不再续聘而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教授已经三年之久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尽管被视为“青年造反者之父”、“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虽然马尔库塞多次宣称：“我一直拒绝这种愚蠢的称呼，它不需要一个父亲或祖父。”），再次面临续聘问题，不过这次他的续聘问题已经超出他的年龄问题，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引起各方的关注与争议，因为他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

X，你是知道的，虽然马尔库塞不算深得我心的人，但那些热爱他的学生却最博我欢心——尽管他们竟然群居且太摇滚、尽管他们过于性解放还吸毒，尽管他们无论男女都留长发并修炼一些神秘的宗教，尽管他们对个性的追求形

式大于了内容，然而相对于于之前或之后中规中矩、乖巧沉闷的大学生相比，叛逆、勇敢、嬉皮的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依然是我不二的学生偶像。甚至在我看来，正是这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否定、全面抗议、全面反叛，在某种程度上让几百年来“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价值与精神，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并带来全面的希望。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借其德国同事本雅明的一句话所说：“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捐弃希望的人的存在，希望才被赐予了我们。”因此，X，我几乎就是怀着某种朝圣的心理前去观看哈佛校园里的“原始尖叫”的，希望能沐浴到那种绝望之后的希望之光，我想，我的心情你能体会。

3.

X，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午夜裸奔”叫“原始尖叫”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项传统起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尖叫”：考试临近的午夜时分，学生们打开宿舍的窗户，一起对着校园尖叫十分钟。哈佛校园里的塞尔比先生回忆说，他来哈佛之前午夜十分钟的尖叫已经成为一个校园传统，1995年他作为学监重返哈佛校园时，这个传统依然保留着。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尖叫逐渐开始演变成裸奔，并在美国校园里蔚然成风。不过在我看来，虽然如今在形式上激进了好大一

截，但在精神上却退化成一种文化与消费符号。一位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学生早早对此叹道：当年的激情演进到今天，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革命色彩，蜕变成哈佛学生面临大考前的一种心理宣泄。不过，当我听到哈佛校园里那戴着夸张的上个上个世纪的大礼帽的年轻导游，将那个自由时代的精神遗留物“原始尖叫”当作一项可消费的观光项目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时，我不禁低头默哀，为半个世纪前也曾在哈佛大学当过教授的热血沸腾的老马狠狠尴尬了一会儿。

马尔库塞曾这么评价自己：“我是

一个绝对善良而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的人。”这种浪漫主义似乎注定他的理论终将成为没有着陆地的乌托邦。X，说实话，来到老马所说的发达的工业社会美国后，我最大的切身感受正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刚来波士顿那会，我整天无所事事。一天，看到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妻发帖急寻帮助。因为他们的住家保姆的家人出严重车祸而回家了，所以他们急需一位保姆帮忙看他们刚刚一岁的孩子。于是，我便去看了半天的孩子。之前，我告诉过他们，我根本不会带小孩；之后，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没法



图为60年代的马尔库塞与学生

带孩子。因为我无法拿各种搭配好的冷冰冰的婴儿配方的罐头食品按时按温度按刻度喂给那个孩子吃，那种感觉就像进了黑客帝国，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我和那个孩子。幸亏第二天，孩子终于被一家托儿所接收。我想，我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孩子了，但我却可以想象那个孩子从此幸福却一眼看见尽头没有任何悬念的一生。在飞驰的路上，我常常会疑惑：一样的街道一样的社区一样的CVS一样的麦当劳肯德基一样的红砖公寓一样的城市，我是否丢失了？一样的GPS一样的iPhone一样的电脑一样的网络一样的信息，我是否可以逃离？一样的面孔一样的经历一样的教育一样的梦想一样的人生一样的按部就班一样的按着刻度进行的生命，我是否可以在狂乱的大街上放声歌唱，或是在那个下大雨的晚上，在校园里裸奔？我哭了。

X，你知道的，对此，马尔库塞给出的方子是“大拒绝”（great refusal），“任何的变革都需要大拒绝，或者用学生的话语说，与这个社会永远对抗”。然而马尔库塞本人也承认，他的方子“只能批判现在，而不能展望未来。因为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做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否定”。简单地说，其实马尔库塞说的就是四个字“只破不立”。所谓的“大拒绝”也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即便是马尔库塞本人也无法做到这种大拒绝，甚至无法拒绝他的教授职位。即便是被马尔库塞寄予过厚望的造反学生，在60年代献身于大拒绝之后也迅速回归，并迅速将他们精神导师老马遗忘在身后——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引起又一波学生抗议，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连续发生民警卫队枪击学生事件，再次掀起学生抗议活动，但随即归于沉寂。至此，愤怒的六十年代终于平静下来。也就是在这一年，易于激动的马尔库塞也变得彻底平静了。这一年，在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再续一年之后，71岁的他正式退休不再续约，不过，他依然拥有圣地亚哥分校哲学系所授予一个非正式的“荣誉教授”称号，并拥有一间办公室。他依然在咖啡和古典音乐声中继续讨论哲学与政治，不过渐渐从“大拒绝”的全面反抗退入到内心世界，专注于艺术与美学。

X，你知道吗？我却很害怕这种被虚假的幸福所填充起来的平静。X，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只一次去看哈佛校园里的“原始尖叫”，只是后来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期待了，也就没有了那么多伤感，只是满脸兴奋地跟着裸奔的学生高声尖叫，借用一位羞涩女生鼓励自己的话鼓励羞涩的自己：裸奔我都不怕，我还怕什么？

是的，没有了希望，至少我们还可以有勇气！X，你说是吗？Q



群山之上，大地深处

—— 盖瑞·施耐德

特约撰稿人 茱茱（香港，juju8711@gmail.com）

四月的天，孩子的脸，乌云环绕着新界的群山，水泥森林的边缘，有人在念诗。

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一号演讲厅，是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的诗歌朗诵会。北岛这两年在办“国际诗人在香港”的活动，盖瑞是第四位访港的诗人。

演讲厅的讲台随意地堆着数个纯白色的正方体，间中摆着几盏红色的铁皮油灯。好像暗示着盖瑞这么多年的山居生活，简单、纯粹，剔除所有不必须的负赘。

满头华发的盖瑞年过八十，在中国已是耄耋的年纪。左耳戴着两只绿色的耳钉，步伐同眼神一样坚定，思维清晰、喜欢打趣，笑也是深深地笑，连同布满脸庞的丘壑。北岛说，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连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50多年前金斯伯格曾经给盖瑞拍过一张照，彼时的他额头尚且光洁，和现在一样精瘦壮实，眼珠里却透着不安分的光芒，他被称为垮掉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虽然他从不承认。垮掉一代早已远去，他也不愿



金斯堡拍摄的盖瑞



多提，虽然他是凯鲁亚克的畅销小说《达摩流浪者》中贾菲的原型，也是无数追求自由魂灵、渴望流浪的年轻人顶礼的偶像。盖瑞不喜欢《达摩流浪者》，批评那是应景的商业之作，然而当年肆意飞扬的贾菲，穿越洪荒却未披风霜，眼里的光芒不减，凝视你的时候，有十二分叫人平和的力量。

诗歌朗诵开始前是古琴名家姚公白的演奏，和盖瑞诵诗穿插进行。姚先生欠一欠身，一则抚琴为流水，二则抚琴为梅花。灯渐暗，后方的白幕上印的是中国山水画。场里无声，只有弦音在泽畔流淌，在梅影虚晃，这大概是盖瑞钟爱的东方意境。

一曲停罢，他拎着盏煤油灯在一块白色方块上坐定，向前排的香港老友默契地笑笑，翻开自己的诗集，那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诗人西川翻译成中文。

他的节奏感极好，下颌的山羊胡子也随着诗的韵律起舞。在他平缓的声音里，断句组章都有了新的韵脚。

最有趣的是他的名作《斧子把》，他提到公元四世纪的陆机，用英文念“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台下有人会意地笑。

“而我明白了：庞德是斧子
陈是斧子，我是斧子
而我的儿子是斧子把，很快
会被塑造一新，模型
和工具，文化的技艺，
我们就这样延续”

而这是21世纪的香港，一个美国诗人在这里朗诵诗，念的却是华夏故国久远的《文赋》。



寻路东方

盖瑞与东方的缘分，始于9岁时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看到的中国山水画。寥寥墨笔，勾勒出了诗人念兹在兹的山脉气韵，也勾起他对东方文化的敬意。从他日后的求索中，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天赋的东方灵性一点点打开的足迹。1953、1954年间，施耐德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修习东方语言，师从陈世骧，并在其指导下动手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包括的唐代诗僧寒山，以及杜甫、李白、苏轼等。他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学界被奉为经典。

对于翻译，学界普遍认为文本在旅行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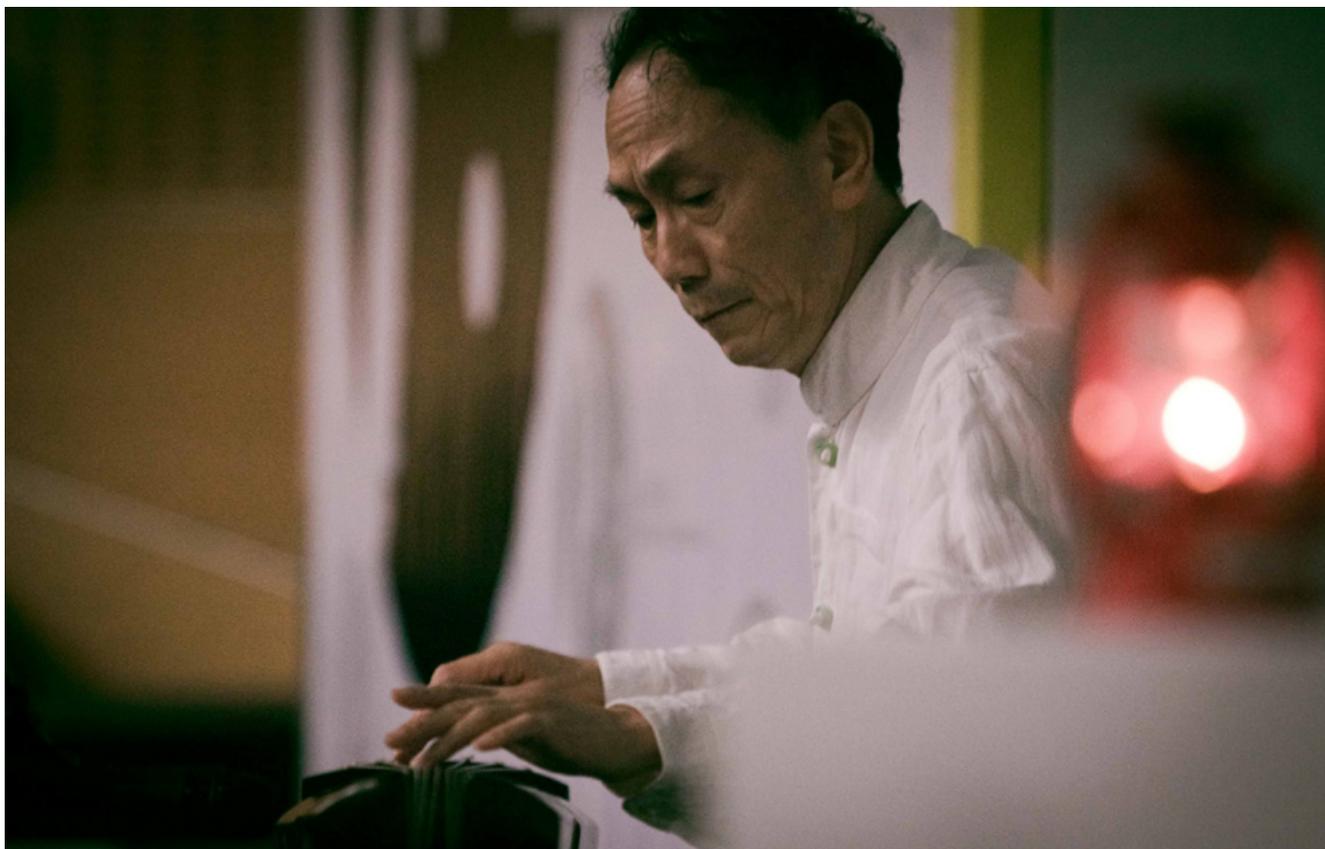
异域的时候必然会遭遇选择性的“误读”，盖瑞干脆认为，所有翻译都是错误的，但绝非有意为之的错误，起码他不是。“三年前我来参加北岛举办的一个关于翻译的研讨会，我注意到日本出的一套纸装书，薄薄的，非常便宜，是各种世界名著的翻译，从古典到现代时期都有。那是在20世纪早期，有一些懂得一点外语的日本人进行翻译的，而且所有翻译都翻自英文，而非源语言。可能为了赚外快，翻得很急促，所以有很多错误，但并不是很大问题，那就是日本了解西方文学的小小窗口，也是一种方式。”



INTERVIEW

198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即拜访了苏州寒山寺，同去的还有盖瑞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以及金斯伯格。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寒山与斯地有关，他们仍然相信寒山曾在此冥思，盖瑞还当场题写了短诗《枫桥边》。从言谈里可以察觉盖瑞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显然他读过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到忠孝礼义的时候他会用中文发音“儒”字，并且告诉你，孝父母、亲子女、重视家庭生活，并不只是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一种近乎普世的认同；与香港诗人茶聚，他很欣赏广式点心的精致，也会好奇地打听广东话与普通话的差别，向列位询问粤语“我手写我口”的特殊性。

1956年——垮掉派诗人正如火如荼的年代，他已经东渡日本，修习禅宗，寻找他心目中的东方智慧。1959年，他成为禅师小田雪窗(Oda Sesso)第一位外国弟子，学习禅宗的临济宗。日本禅宗戒律严格，和中国宋代相近，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严峻的考验：劳动、打坐、悟公案，对长期生活乡野，亲近自然的盖瑞并非难事，“倒是爬山对我挑战更大一些。”他不以修禅为超脱了得之举，认为人人皆可修得，并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如与其差不多同期修行的老友金斯伯格，跟随的师傅在喇嘛教中属异类，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倒也契合了他“狂暴的灵魂”。



盖瑞朗诵时的现场抚琴



临济宗的清规戒律似乎更贴近盖瑞的个性，钟玲曾记录她亲往加州群山探访盖瑞的情景，盖瑞带她去看隐蔽于丛林断崖边的书房：“一个抽屉里整齐地排着几十个文件夹。分类非常详尽；有他二十年前在大学念考古人类学时，每一门课的笔记和报告，有西野山脉树木的资料，有圣璜区的地质报告等等。”他是个严谨而善自律的人——他本人也这么认为，在与人的对谈中，任何问题他都会思虑妥当才会相告。这一点也很精妙地体现在他对宗教的亲疏中：他在朗诵会上念了他今岁的一首新诗《夜晚故事》：“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穆斯林，一个基督徒或一个犹太人，因为‘十诫’在道德上还不够严苛。《圣经》的‘不得杀戮’遗漏了其他生命王国。”

关于盖瑞的信仰问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农场的小牛死后，8岁的盖瑞问牧师：

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吗？牧师答：不能，他因此而对基督教失望。访问中提起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他并没有否认对基督教的兴趣：

“我曾经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广泛研究和学习基督教，我对他一些原则性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摩西十诫里讲不杀生的戒律，其实很明显是针对人类的，不能囊括万物生灵，而印度教和佛教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很显然，他反感于基督教以人为中心的教义，一如他反对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

有趣的是，盖瑞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于食肉，他认为是一个礼仪上的问题：“藏传佛教及中国其他宗教都有涉及这个问题，在印度佛教中非常强调素食的观念，但是西藏人认为他们的环境无法种太多蔬菜，必须要吃肉，但是我们在杀生时是抱有感激的，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杀过生。”

大地之子

对生物和自然心怀感恩的态度，与盖瑞所钟情的印第安文化大有异曲同工之处。印第安文化几乎是他本土意识的真正来源，一方面他心怀白种人掠夺其家园的愧疚感，另一方面他也对印第安人通达的自然观深抱敬意；他迷恋远古印第安人神话里寓意复杂而有争议的形象：土狼、黑熊、巫师、驼背的吹笛者；左耳两只绿色的

耳钉，是在妻子生育之时所穿，以示为妻子分担生育的痛苦——那也是印第安的傳統；印第安人海达族是施耐德学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海达人的观念中，人与所猎之鱼不仅平等，且是彼此循环相依的。他们感激动物作出的牺牲，并相信来世会以自己的牺牲相报。施耐德说：“印第安人会杀动物，但他们会记得道谢。而欧洲人和美国人



做不到。”

显然，东方思想和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融汇浇筑了施耐德的生态观，他时常强调人类要向土地学习，对待自然只可以取其必需，而非滥杀滥砍，1967年钟玲入山拜访他，他们的厅堂敞亮空旷，没有家具，晚上竟然是拿睡袋在森林里露营。他对自然和土地的亲近到了执迷的程度：“你必须了解那一片土地，并且向那片土地上的动物、植物学习。一定要尊重土地、动物和植物，因为比起他们的历史和智慧，人类文明太幼稚了”。道法自然，中国的《道德经》对他颇有启示：“我最看重的观点是大自然的流动过程，就像水一样，我们能够讨论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不用发明一个神上帝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一部份。”

盖瑞遵循古代部落及神话的礼教仪式，也不断尝试与自然的沟通，甚至是自己

的婚礼——1967年，他与雅·上原在日本濑岛火山口举行结婚仪式，在这个小岛上1800英尺高的活火山口边上，他们相信这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大自然的中心，希望在这里能祈求得到动态的、能量极强的大自然的祝福。

大地枯荣，轮转流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盖瑞大概是同意的。他从不担心死亡，几年前他的第三个妻子卡柔患癌去世，生前曾把一句西藏谚语贴在墙上：“死亡为真，翩然而至，此身将为枯骨”。他说死亡不是平时会去苦恼的问题，而是真的降临到你身上，自然就学会应对的问题，“当你所爱的人死时，你才会意识到葬礼等仪式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会对食物说感谢，对自己说感谢；当你爱的人走时，你要学会告别，这都是需要学习的。”而在禅宗里，这样的修习被称为“成为真正的人”。

骨圈禅堂

如今的施耐德仍旧居于内华达山脉的山林之中，此前的十五年一直没有通电。自己伐木造屋，火耕水种，有时候扛着猎枪去打猎。从容于山水间，远离尘嚣挂碍，出世入世的问题，于他显得可笑。“我从来没有隐居，我曾经在森林里做守林员的工作，每天还需有两次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进行联系，当然还会拿薪酬——那只是一份工作”

他笑。三十多年前，他建立了骨圈禅堂，禅堂是为纪念逝去的友人卢·韦曲(Lew Welch)，名字得字卢遗留的诗句：“我看见自己/一圈骨头/在清溪之中”。

施耐德现今也做了禅师，在他的禅堂领着学生入定悟道，让临济宗在美利坚扎根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手执珠串低眉垂目，眼底奔流的安详圈起了他的理想国，



那是千百年前中国诗人寒山隐逸蓬勃的风骨。他更欣赏的是生活禅，一如他曾为之着迷的日本传统手工艺品，他享受那种世代相传的精妙手工艺完成的快乐，“现在太商业化了，很难找到真正的民间手工艺品，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我会自己做陶罐、种蔬菜、编织、缝纫”。他也会批评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愿动手做事，只沉溺于自我的思想：“反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知识份子之间的一个有趣分别在于，那些反文化的积极分子并不是精英分子，他们愿意自己干苦力活，而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只愿意学习课本知识。”

盖瑞提倡修禅时的“忘我”，并且推

及到日常生活，他欣赏的日本禅师道元（Dogen）曾经说过：“我们学习自己就是为了忘记自己”，“怎样忘了你自己？”，“就是忘了你自己。”，他轻抚下巴的胡须笑。

“你打坐沉思的时候不应该以提高自己为目标，不应该想着成就什么，只是这样去做，这样才能达到忘我的境界。就好像一个人专注练书法的时候、一个母亲照料孩子的时候，都已经忘我了。”看来，专注而忘我地做一件事，就已经是盖瑞生活禅的主心骨。

盖瑞一世追随东方精神，却是去到久远东方的浩繁传统里，用亘古安详的传统抚平现世的躁动，眼下的世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之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



的触角迅速渗入人类生存的每一方寸土地，虽然盖瑞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交互施肥”的结果，但很显然，在资本主义浇筑下的现代社会果实并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一些商业活动，已经将这种企业文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了，所以是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具有毁灭性，不但对东方国家，对其本身也是如此。”简单汲取不再是西方的强心针和救命草，以盖瑞的说法，“西方并没有强制东方去建造汽车、大楼，或是参与到这些经济活动中，很大程度上中国和整个东方社会是自愿卷入这场潮流中的，所以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东西的区别了”。想一想，盖瑞又略带狡黠地笑：

“我想中国已经是问题的一部份，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份”。

解决问题的法门在何方，盖瑞一定会说不知道，他只找到了令自己心无挂碍的法门。当年嘶喊着自由飞跃公路尘沙的少年，如今胸口装着的，是谦卑于山川海河的纯净与光荣。他永远属于他的群山，隐於大地深处：

“天空，白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踪、鹿迹，
我们知道什么。”

Q



海上之夜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